

主持人语：本栏目两篇文章在研究对象上各有异趣，但它们都同时聚焦网络技术形塑大众日常并构成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技术的问题。这并非新的分析，但两文并不“执迷”理论概念和宏观层面的讨论，而是怀抱质朴的心态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去追寻答案。在对一个白族村落深入调查后，杨星星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和新技术将村民置于一种技术性秩序中，传统村落也可能形成一个线上的新型社区，文章还试图对社会学传统议题给予回应。赵呈晨拾起网络语言的老话题，却赋予它新的阐释。她关注网络语言的日常实践，认为网络语言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而存在，而是嵌入到具体的社会系统之中。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嵌入”的视角。一个传统村落中微信社区的建构，是嵌入到现实乡土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的过程，呈现出网络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复杂纽结的关系。网络语言的使用，是人们将网络化生存镶嵌进生活空间、社会关系网络和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过程。这些深度观察和思考，对于探讨网络和社会变迁、文化表达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价值。

主持人：孙信茹

## 嵌入乡土的“微信社区” ——基于一个白族村落的研究

杨星星 唐优悠 孙信茹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本文采用田野观察的方法，聚焦于一个白族传统村落通过微信形成的全新的网络社区。研究发现，村民在手机和微信里将传统的现实生活与网络世界结合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并被大家所认可、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实践形成“微信社区”，从而将村民置于一种“技术性的秩序”之中。“微信社区”的存在，一方面让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脱域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由微信建构起来的这个新型社区又在“嵌入”其现实的乡土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对石龙村微信社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新技术和网络逐步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活动之中，从而使传统村落形成一个线上新型社区结构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区结构对传统社区中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微信社区；白族；村落；微信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2；G11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杨星星，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唐优悠，云南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硕士生。

孙信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XW058）。

## 一、问题的引入

“我娃娃要在昆明开个剑川火锅店，到时候开业喊起群里在昆明打工的朋友还有你们一起来耍！我再把三弦拿上，剑川人聚在一起必须要弹三弦，我们喝喝酒、吹吹牛、唱唱调子热闹一下子！也请你们在朋友圈里面给我们宣传一下！”当调研团队离开白族石龙村的时候，村民李根繁与我们这样道别。他所说的“群”指的是外出打工和上学的村民组建的“石龙闯天涯”微信群。

石龙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倚靠当地著名的石宝山风景名胜，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只有一条村级柏油路与外界连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当地为白族聚居村落，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白族传统文化，因此，这个村落成为当地民族和民俗文化示范村。在世人眼里，这里俨然一个古老村寨，如同费孝通笔下那个乡土气，地土气，文化也是土气的乡土社会（费孝通，2012：9-12）。

自2011年开始，研究者在该村落展开田野调查，几年间多次往返石龙村，累计在村调查的时间超过了6个月，较为深入地观察了网络和新技术在村落发展的历史脉络。2019年1—2月，研究团队共10人对田野点展开为期1个月的调查，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村民的新媒体使用，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运用展开田野调查。累计访谈人数达到100人，其中深度访谈50人。

研究者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村民们被卷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新世界，手机为人们提供着畅快的联络和沟通，微信将人们的生活不断搬进网络的空间，村里小卖部门口挂着的Wi-Fi密码无时不刻在提醒人们，网络已经成为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深入到村民们的手机和微信生活中进行观察时，会发现村民们在微信空间中架设起不同的群体结构，组建不同的群体类型，连接了多种类型的群体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石龙村民在微信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群体聚合方式，构筑出一个交织着复杂关系的线上空间。

石龙村这个线上空间，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虚拟空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实有社区的基础上，有着来自现实可触的社区空间，村民们在其间所展开的活动既是对现实社区和空间的“移植”和“延伸”，但同时又创造出了一个和现实空间截然不同的新型社区。伴随这个线上社区的形成，村民们在当中聚集、互动，展开新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如果将这个线上社区称为“微信社区”？这个社区如何构成？它与现实社区的关系如何？

“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理论来源和内涵阐释较为丰富和复杂。该领域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学者滕尼斯，他把社区定义为地域范围较小的、其居民具有较紧密的相互关系的、传统性较强的地方性社会，把社会定义为大规模的、关系较松散的、现代性较强的社会（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2006：4）。社区或共同

体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滕尼斯，1999：62）。到了涂尔干，他提出共同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紧密的社会约束力、对社会机构的依附和参与、仪式庆典、小规模人口、相似的外表特征、生活方式及历史经验，相同的道德信仰、道德秩序等（陈美萍，2009）。此后，还有学者提出社区不仅仅是具有地域性的社会群体，还是一种社会网络。甚至美国社会学家韦尔曼更是提出了研究社区的新的视角——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陈福平、黎熙元，2008）。Hillery在收集了 94 种社区定义后，提出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地域（area）、共同的联结（common ties）是社区的本质（刘江，2016）。从不同时期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社区的概念和研究范畴不断得到延伸和拓展，如果说传统社区研究中对地域、社会群体、共享的情感和文化等要素较为强调，那么，随着研究者的探索，社区研究逐渐转变到社会网络、关系连接等问题的讨论上。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加剧、传统社区边界被打破，新的社区开始不断涌现的当下中国，不少学者对社区转型和人们新的联结方式产生研究兴趣，开始关注媒介在社区凝聚和传播中发挥的作用。有学者开始探讨新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特定社群的社会生活，并提出社区是考察传播行为中制度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互为作用理想场域（丁未，2014：39）。

进入互联网时代，社区研究逐渐与网络空间相连。有学者认为虚拟社区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间不同的电子网络空间（cyberspace），社区的居民为网民（netizen），他们在一定的网际空间围绕共同的需要和兴趣进行交流等活动，并且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胡鸿保、姜振华，2002）。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影响下，时空得以重组，社会关系的组织和连接方式得到重塑。现代社会的联结成为一种“脱域的共同体”（王小章、王志强，2003），那么，这种脱域的机制如何形成，网络和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此外，当社区的边界得到了大大扩展之后，人们在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中可以展开不同的转换，也必然会带来社区实践的多元和复杂。因此，“这决定了我们应该从社区实践维度理解多元社区”（郑中玉，2012）。从互联网与社区实践的角度来看，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做了颇有意义和价值的论述。有研究者把网络论坛看作一种特殊的虚拟社区，探讨社区网络论坛在建构社区认同、协助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谢静，2010）；与此相关有研究者认为社区居民通过新媒体平台展开参与式传播，促进社区居民的自我赋权（王斌、古俊生，2014）；还有研究者关注到在传统村落的公共领域中，数字社区的出现为村民的公共行动提供了线上的可能，进一步强化村民的社会关联（牛耀红，2018）。在这些不同的观察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窥见研究者对网络空间及网络社区所具有的特质较为重视，他们试图在媒介技术及其形成的独特空间的基础上对新平台与联结方式进行深入探析，因此也会较多关注这些新型社区为人们提供的多元和丰富的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田野对象尽管是固守着传统社区生活方式的村民，但是，他们建立网络的新空间并在其中展开创造性的实践。由此，值得探讨的是，当这些村民穿梭游走于现实社区和网络社区的时候，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这种网络新型社区与现实传统社区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进一步说，如何从社区实践的角度，去发掘和理解这个新型社区空间中形成的“组织”与“关系”？而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社区实践和学者们讨论的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赋权等概念不同，我们更强调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如何在线上建立新的生活空间并展开网络文化实践的过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网络和新技术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全新的网络社区之中，新型社区的生活越发成为一种常态。借此，我们还可以观察网络和新媒体对于传统社区生活和文化模式所带来的影响。

## 二、作为传统社区的石龙村及其微信使用

### （一）石龙村的传统社区

石龙村作为一个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村落，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个具体可以观察到的实体社区”。截止2019年，全村共有288户，1257人，除少数彝族、傈僳族和汉族外，白族占总人口的80.4%。白族是石龙村最早的村民，分为张、李、姜、董四个大姓八个家族，按村里人的说法“每个人都沾亲带故”。赫尔德倡导的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共同精神：家庭、民族、语言、感情（Herder, 2004），在石龙村鲜明地体现出来，同时，通过血缘、姻缘、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也结成了滕尼斯广义的“共同体”。

石龙村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村民所从事的活计和营生却异常丰富。农业以种植马铃薯、苞谷、白芸豆为主；依托山林资源，当地村民在农忙空余时上山采集松茸、牛肝菌等野生菌，获得较为丰厚的收入。除了传统的农业、畜牧业、采摘业，村里还出现了运输、建筑、零售、微商等职业类型。因为背靠著名的风景区石宝山，距离近年来火热的旅游点沙溪古镇不远，加上村落有着丰富的白族传统歌舞和悠久的历史，霸王鞭舞、白族对歌、洞经音乐演奏、本子曲、滇戏演唱等文化活动保留相对完整。近年来，村民们开始尝试旅游服务、餐饮客栈和文化经营活动。

2002年，剑川县人民政府将石龙村列为白族民俗文化村。石龙村以村委会领导班子、经营大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主架构起了村落的核心组织结构，村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对村落发展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政治精英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扶贫工作队、计生办、卫生所、联防队的成员；经济精英主要集中在村里开农家乐、客栈、经营土特产的微商等群体；文化精英主要由白族调、霸王鞭等非遗传承人及乡村教师组成。在石龙村，非遗传承人有二十几人，他们不仅是当地有名的民间歌手和



表演者，而且他们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常到各地表演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因此，村里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也多集中在这部分人中。从社区特性来看，作为行政村落的石龙村符合帕克对于具象社区的认知：“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三是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Park, 1936）。

## （二）石龙村的微信使用

石龙村的手机和互联网在近几年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大部分家庭陆续安装无线网络的移动数据盒，目前接近40%的家庭开通无线网络。除了老人和小孩，几乎所有村民都拥有手机，手机里必不可少的就是微信，村民们接触和使用微信的动机不一。有人是为了销售盈利，在石宝山景区大门口摆小吃摊的张福娟因为总有游客提出要微信支付，她便花350元买了第一个智能手机并注册了微信，在摊位贴上了一张绿色的收款码，“从此不用再担心找零钱的问题了”；80后“白曲王子”李根繁在大理白族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擅长交际的他在村外的朋友众多，他经常发布一些自己穿着白族服装背着三弦到处演出并接受媒体采访的图片，偶尔也会发一些拣松茸、采蜂蜜的照片来“植入广告”，“我微信里面有1200多个好友，他们看到我的朋友圈就会来找我买这些东西，我毕竟也有点小名气嘛，他们信得过我”。还有人是为了更好的与家人通信：在丽江餐馆打工的张坤龙见到这个“说一段话当短信发”的软件很是好奇，学着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并且教会了家中的父母，“现在我手机只要连上Wi-Fi，想跟家里打多久电话就打多久，还可以开着视频让老人看看我”；如今已是沙溪镇副镇长的张四宝一直都引领着村内的技术潮流，作为村里第一个买手机的人让他十分享受村民们羡慕的眼光，“见过世面”的他也是村里最先一批注册微信与在村外闯荡的村民加上好友的人。也有为了工作或者是娱乐：村扶贫队员陆晓云日常工作繁重，经常要翻山越岭去村民家送材料，“现在很多表格都可以让他们从微信上发给我，我少走了好多路，你看现在人都胖了一圈”；张根发是村里的白族调爱好者，“怀才不遇”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村里仅次于三个白曲非遗传承人的第四号歌王，只是苦于当众演唱时的害羞，所以一直没能评上非遗传承人，现在他把自己演唱的曲目录制在了手机里，就可以发给微信上朋友听了，“我就是村里公认的四大白曲歌王之一了”。

无线通信基站的建设为石龙村民跨入信息生活提供了基础设施。即便是从事农业、采摘、旅游等活动，村民也要逐渐适应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交易和连通方式；传统和植入日常生活的白族调在微信对歌群出现后，喜欢唱歌的村民能够更为便捷地“想唱就唱”；村落虽地处偏远，但这些年不乏人口的频繁流动，人们借助手机和微信将外部世界和信息拉回自己生活的传统社区里。在基础设施、技术普及、经营贸易、人口流动以及文化表达等力量的驱动下，加之微信使用的低门槛，让经济文化层次不等的广大村民

使用微信成为可能。

在村民的微信使用中，随着使用者的增多，一对一的联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更多的交流诉求和功能被村民们发掘和利用起来。石龙村微信使用最为突出的就是那些仿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微信白曲对歌群。“我们唱一首白曲要一分钟的时间，有了微信可以发六十秒的语音，就有人在群里开始唱起调子来了，那下子村里出来了好多个微信对歌群，走在村里路上，家家户户唱调子的声音就会透过围墙传出来。”与其他歌曲不同，白族调中两人相互对歌演唱是其精髓，白曲传承人李根繁说：“我们对歌都没有固定歌词，全靠我们现编，我即兴作词唱一首调子，对方也会就我的词即兴创作唱一首来回应我，现在在群里面我们就可以一个人跟好几个人一起对歌，或者多人一起对。”不仅在群里演唱，一些群主还会定期举行线下的聚会活动，人们在微信群里“以歌传情”，更将这种情感交流和认同从网络空间延伸到了现实生活中。

除了因趣缘而建的对歌群以外，基于血缘、业缘、工作组织等特征的微信群也相继出现，这些群将现实生活中具有相似圈层结构的村民们聚合到一起。在昆明读大学的李安利教会了父母使用微信，其父母又教会了年龄相仿的叔伯，之后创建了家族群“村东头的老小可爱们”，李家所有用微信的成员被拉进了这个微信群。扶贫工作队队长创建了“石龙建档立卡户”微信群，将工作队的队员以及七十家建档立卡户拉进了群里，开会就不需要特意上门通知，一些工作和政策也能及时在微信群里“昭告全村”。此外，石龙的党支部、村委会、联防队建立有专门的微信工作群，辅助相关部门组织日常工作的运转。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创建了“石龙人闯天涯”，平时在群里分享家乡的消息和转发一些白族文化的推文，重要的是，在这个群里，谁有困难说上一声，群里就有人相互帮忙。快递点老板张吉昌创建了“快递包裹通知群”，拍一张快递单目录放群里提醒村民领取快递，身兼村卫生所所长的他还创建“预防接种与体检信息群”通知村民接种疫苗，同时也在群里给大家进行线上问诊。

石龙村民的手机和微信使用，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相生相伴。村务工作群基于村治格局中的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组建，村民的打工潮和人口流动牵引着外出打工群的建立，血缘纽带下催生着家族群的构建，取快递、就医等日常生活驱使着相关微信群的产生；丰厚多样的文艺土壤也给微信对歌群提供着基础，还有商品交易、农业贸易等日常活动，将那些着拥有共同特征、共同工作、共同血缘、共同爱好、共同经历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如果说，传统村落有其自身的组织方式和结构逻辑，而今村落里组建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微信群，使得村民聚集和连接有了新的平台和方式。在这种新的连接和组织方式下，村民们延伸和拓展着自己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圈，同时，在这个传播结构中，基于微信群—朋友圈、群体一个体、实体空间—网络空间等不同的层面，一个多重交织和复杂的新型社区开始慢慢形成。这个社区尽管源自一个传统的现实社区，但我们更看到网

络和新媒体使之形成的新的聚合方式、社会关系及互动形式，甚至在某些层面（如社区精英对微信群的创建和管理、白族调在微信群里的复兴）还实现了村落社会和文化的再造。由此，我们将这个新型社区称之为“微信社区”。

### 三、石龙微信社区的构成图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村民使用微信的基本情况如村主任所说：“村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有智能手机，用智能手机基本都有微信”。按将近1300人的总人数来计算，那么使用微信的人就达到了900来人。我们一共访谈了100个左右的村民，其中包括从15岁到55岁的村民，除了一直务农的村民，还兼顾了村里的学生、村官、外出务工者、司机、微商、乡村教师、文化传承人等不同类型的人。同时，在访谈中我们还考虑到了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差异性。在这些不同的人群中，既可以发现人们使用媒介方式、信息需求、知识观念等方面具有的差异，还可以看到他们运用微信联结起来的不同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对微信群创造性的使用方式。

#### （一）架构村落网络社会的微信群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本村村民组建的各种类型微信群不下100个，我们记录和观察了其中的62个微信群。按照这些微信群线上社区和现实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的关系、微信群的功能和用途、社群边界的划定等因素，我们将这些微信群分为趣缘群、官方群、便民群、家族群四种主要类型。

我们把白曲群、牌友群、好友群等划为趣缘群类型，这是石龙村使用人数最多的微信群种类，其中白曲群数量最多，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类群通常并无线下明确的组织和构成人群，主要由一群有着共同爱好的人或几个好友组建而成。这类群的组建较为松散，进入和退出比较随意，也没有特定的“群规”和要求，偶尔有些规定，如群里要有白曲著名歌手“撑场子”，群里夫妻同在的较少，发布内容主要就是歌唱等，但这些规矩也大多约定俗成，群内成员并不强求。人们在这类群里的活动最主要就是对唱白族调，分享见闻也较少，唱到高兴之余，发红包是群里最热闹的活动。

这些年来，因为村委事务的繁多，在微信里组建官方群也较为普遍。村委会、村党支部、各村民小组、党建、扶贫工作队、村卫生所、村森林防火队、景区管理、村文艺表演队、疫苗接种等都有各自区分明确的微信群。这类微信群的创建者通常是相关组织的负责人，群成员也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在微信群中讨论的内容与工作的主题相关，参与者不大闲聊，主要用于通知信息发布、召集村民开会等事务，如果遇到比较重要的村内大事，人们也并不完全习惯在微信里讨论，线下的集中显得更为重要。群内的成员往往在不同的群里都有交叉和重叠，这和他们在现实中的身份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与工作无关的人员不会被拉进群里。

便民群的组建和村里人员、物资、信息流动分不开，主要包括快递包裹通知群、老司机群、外出打工群等。这些群里有的充分发挥出微信便捷快速的优势，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平台，如通知领快递、借车用车、结伴帮扶、提供务工信息等。有的群则由某一些特定群体的人组建，如“石龙老司机群”，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石龙村拥有汽车的村民，他们大多为男性，年龄也主要集中在20到30多岁之间。便民群的群主通常都是村里交际能力较强的人，成员的参与性都较高，发布的消息大都和自身利益相关。

家族群一般是以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家族成员共同建立起来的，群里包括父母、兄弟、妯娌、子女、叔侄等成员，这类群的创建者都是家族里的年轻人，他们使用手机相对熟练，群里的聊天内容主要是发红包、分享信息和聊天。这类微信群的边界以血缘和家族建构起来的，非家族成员不能进入。

除了这四类最主要的微信群之外，村里偶尔有一些较少人群组建起来的群，如同学群、麻将群、好友群、战友群、木雕群、宝妈群等，但较为固定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以上述四类群最多。官方群、便民群和家族群或基于村落组织机构组建，或和公共事务相关，或建立在家族血缘基础之上。他们如同线下现实权力和交往网络的映射，很大程度上保留着现实社区的秩序规则。而以唱白曲为主的趣缘群，虽然其中成员也有诸多线下的交集和现实中的关系网络，但是这个群里的人彼此并无太多的利益关系。当然，对于很多石龙村民来说，不少人在几个群里都交织重叠出现，并且，这些群里还有较为明显的核心人物，他们往往成为各个群的重要节点。村落里各类微信群连接交织，建构出一个丰富的网络社区。图1展现了这些微信群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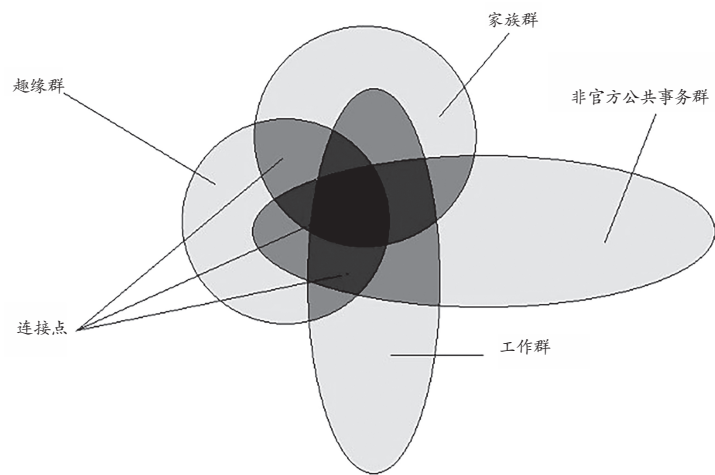


图1中不同的圈意味着不同种类微信群中的成员，相互交织的部分表示加入了多种



微信群的村民，而颜色越深，表示个体加入的微信群的种类越多，因此连接的微信群也就越多，这一类人就是微信社区的主导节点。通过对村民手机使用的观察，我们发现主导节点往往是那些在村内拥有影响力、频繁参加公共活动且具有一定社会资源分配能力的个体，他们是村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相较于普通的村民，他们加入了更多种类的微信群。

如村委会主任姜伍发是当地著名的歌手，也是云南省级白族调非遗传承人，因此各个白曲群争相邀请他，并请他在群里指点其他村民唱歌。作为村干部，扶贫、党建、联防队等官方群也少不了他。此外，老司机群、外出打工群等便民群也有他的身影，加上他自己的家族群，这让他在线上的参与和活跃度都极高。村卫生所所长张吉昌在自家开的小商店里设了一个快递点，同时他也是村内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除了给村民看病，他还要完成快递收发、电商服务等事务。因此，他不仅要在卫生系统的工作群里和别人联络沟通，还要履行好自己组建的快递群群主的职责。张益民是村里80后的致富带头人，被村民认为是相当“活泛（聪明）”之人，会做生意、广交朋友，他一边在景区开车跑客运，一边经营着电子商务、农家乐。张家是村里的大户，人丁兴旺，家族里有村支书、饭店老板等人。作为经济精英的他在三类微信群里最活跃：便民群里拉客运的订单，趣缘群里发红包推荐自己的土特产。石龙村的微信群，将“人以群分”在微信中重新演绎，让村民们凝结为一个新的网络社群。

## （二）作为“微信社区”的石龙村

当微信嵌入传统乡村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以后，微信不仅将人与物的流动、文化活动与仪式、社会关系和交往等现实生活搬到网络世界里，同时还对个人、家族、村落以及民族认同的凝聚产生影响。可以看到，石龙这个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被微信“结构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石龙村成为一个“微信社区”。它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和群体在微信中聚集。Rheingold认为虚拟社会群体是“一群足够数量的人，透过充足而长久的公开讨论，具备充分感情，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一个基于私人关系网络的社会聚集”（Rheingold, 2000: 43）。人和群体作为社会交往的主体、文化的承载者、规则秩序的制定和被约束者，是社区存在的基础。石龙村民根据现实社会中的血缘、族缘、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等差异形成具有结构性的不同微信群。一方面，这些微信群是现实社会关系和生活空间的线上呈现，同时，线上生活又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关系，将不同的人通过新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这些个人、群体、组织在微信中的聚集，正如同帕克对社区的界定那样“需要有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Park, 1936），这些微信上聚集的村民给予了微信社区最基础的成员以及组织保障。

其次，形成凝聚成员认同的共同体。无论是日常乡民对话使用的白族语言，还是村

落共同的仪式和节庆活动，石龙村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彰显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和认同。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友谊等纽带基础上，表现为家庭、家族、村庄和城镇，人们倚靠默认一致与和睦团结，“共同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对社区的归属与认同，其中共同的精神文化意识是其精髓（滕尼斯，1999：2）。微信介入以后，维持共同体核心的精神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借助着微信平台得以实现。唱白族调、重大仪式和节日庆典在微信里的传播，进一步增强了石龙白族人的民族归属感。“民俗文化一家人”的群里，人们在唱白歌之余也会分享一些“白歌王子的故事”“白族人必须知道的十条习俗”等推文。对于外出的石龙人，微信的跨地域连接，实现了人们与乡土的联系，让他们的根仍旧牢牢扎在乡村，实现了虚拟共同在场，加强了个人与族群之间的双向认同，微信群成员们结成了息息相关的共同体。

再次，微信空间为人们提供媒介实践活动的平台。“在智能媒体时代下，WEB2.0技术不断促使传播由‘点到面’向‘多点到多点’的互播模式转变，互播模式的群体交互性使互联网天然地具备了社区的特质。”（蔡骥，2014）如同现实社区里人们的活动一样，在微信空间中，人们在这个平台展开传播实践：人口流动催生着外出打工群的出现，也使得家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关注家庭成员动态信息的变化成为常态；石龙村丰富的土特产资源促进了人们利用微信销售产品；白族文化和多样的民间艺术，在微信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乡村公共事务的繁重使得微信这种便捷的沟通方式能够被利用起来；村落传统乡土的格局让家族微信群日渐活跃。如果说，村民们组建和参与的各类微信群是石龙微信社区的基础架构，微信群里的交往与互斗是村落现实社会结构的再现和复杂社会关系的线上延续，那么，村民们在微信朋友圈中内容的发布和书写，则将个人、族群和外界社会勾连起来（孙信茹，2016）。因为可以更多满足于个人的记录和表达，这就使得朋友圈内容的呈现不同于微信群里的交流与沟通，也不像微信群里首要的是满足人们的特定需求或彰显确定社会关系。在朋友圈中的内容呈现如同微信社区里人们的日常点滴与个人“叙事”，将人们的喜怒哀乐纳入这个网络社区中，使这个社区实践变得生动鲜活。

最后，多层次立体化的信息流动和社会关系连接得以实现。媒介蕴含着连接，人们在微信中的单独聊天，微信群的公共讨论，朋友圈里的情感表达，公众号的信息分享等多个功能的使用，使得这个空间中的信息流动包括了个人生活世界的呈现、商品和贸易的内容交流、互帮互助的信息传递、村落公共事务的传达和讨论，还有白族调微信对歌的流行。这些信息流动实现了个体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之间、群体与外界等多个层面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不仅带来通信方式、人群聚集、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同时，对于技术的创造性使用，更使得人们围绕技术形成了新的互动与社会关系连接的方式。例如，新型群体在微信中出现，年轻人有了和上一辈不同的组织方式；微信赋予社区成员新的角色和身份，一个活络的村民有可能在线上身兼数职；微信群为人们提供

对山歌的新空间，却也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出新的歌手与“明星”，同时，微信对歌使得村民交往能够轻易跨越村落的边界。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所谓“微信社区”指的是在以微信为主的网络平台中，人们通过技术方式连接组织，形成网络中独特的社会结构，从而建构起来的新型网络社区。它建立的基础有别于传统的现实社区，但也和纯粹在网络中建构起来的虚拟社区有所不同。对于石龙村的“微信社区”来说，它即来自于一个可以具体观察到的实有社区，有着线下坚实的组建基础，如有着以家族、语言、文化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其成员来自特定的家庭、家族和村庄。当然，这种“微信社区”也和现实社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从其建立的技术环境来看，这个社区是一个网络交往空间，人们凝结成的新的交往模式不同于传统乡土社区。

#### 四、微信社区与传统社区的互动及关系

石龙村的村民对手机和微信的普遍使用，使得这个传统村落形成一个全新的线上社区，那么，有必要追问的是，这个微信社区和传统社区的互动及关系是什么？对微信社区的探讨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 （一）再现与创造

石龙村的微信社区既是现实社会结构和社区成员关系的再现，又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对技术的使用和创造使然。从再现的角度讲，石龙微信群的架构“脱胎”于现实的组织机构和村民的现实生活。现实社区中的村党支部、村委会、扶贫工作队、卫生所等机构在微信群里有相应呈现，“像现在的这些有官方背景的工作群，基本上就是你分管哪块业务你就建哪个群，‘石龙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我们队长建的嘛，然后像‘石龙党建先锋群’就是村支部书记建的了”。访谈中扶贫驻村工作队队员的描述就是最好的例证。伴随着入群的成员，现实中的权力和威严也一定程度移植到了微信群里，“领导在的群里我们不敢乱说话”。石龙村民最爱唱白族调，自从人们在微信里组建了大小对歌群后，村民们演唱白族调形成了独特的“媒介景观”：但凡有空闲时，村民手捧手机放声歌唱成了村里最常见到的情境。喜爱白族调的村民少则加入三五个山歌群，多的则不少于一二十个群。他们将现实的娱乐和日常生活方式搬到了微信中，微信也在对山歌的过程中不断促成人们情感的传达。

然而，村民们并非简单将现实社会和生活搬到微信中，微信使得人们得以突破现实的局限和障碍，将人们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开创了属于微信社区中独特的连接和组织方式。村民经济收入提高和流动的频繁，村内汽车拥有量大大增加，有了“石龙老司机”群，从此，村民们坐车外出也开始了“网上预约”。更重要的是，

入群的人都有相对一致的想法：“大家捎个东西，搭个便车，谁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大家就在群里吼上一声就可以互相帮忙。”微信群的建立，使得有相同基础条件的人们重新连接在一起，形成乡村新型的互帮互助形式。为了适应微信的技术特点，人们在群里也展开着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如山歌群里群主对加入者的身份管理，对著名歌手和一般村民的区别对待，对维持本群协调氛围和稳固著名歌手地位，甚至邀请相距甚远的歌友线下聚会等做法，创造出了微信社区全新的社会互动和连接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微信社区如现实社区一样，有着自己的管理和运行规则，如很多微信群都有“不能发广告”“抢走别人的专属红包要退出来”等规则，微信群主也按照自己对于理想网络社区的理解与想象，利用拉人入群、将人踢出群等方式维系微信群里的规则和秩序。

## （二）改变与延伸

石龙村的微信社区通过网状的结构连接着村落内外，这种连接使得这个新型社区得以突破很多传统社区的时空局限，也一定程度上对村落的血缘家族亲属关系和凝聚方式、村民生活方式和文化表达形成影响。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血缘关系对于共同体成员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群体内部，也会存在明显的等级性。而今，村里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家族群，血缘共同体内部的等级壁垒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淡化。“村东头的老小可爱们”这个基于张家几个兄弟的关系网建立起来的36人的家族微信群，扩大到旁系亲属，家族群里父母跟子女的对话让其他人也能够共享，很多平时都不联系的远亲也聚集在了一起。对于这个传统社区而言，家族共同体常常因为一些节庆或是重要的仪式活动才会围聚一堂，而借助微信群，家族成员取得了在线的“共在”。可以说，家族微信群使得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在网络中得到了延伸。

石龙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尽管这些年村落社会流动加剧，村民与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但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还是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微信一方面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同时又使得村民与新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性理念的连接更为自如与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微信的出现一方面使得白族调、霸王鞭等民间艺术形式的表演和呈现平台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同时又让村民们在新的技术平台中找到了文化表达和再现的新舞台，甚至使得这些新媒体平台成为文化传承新的延续。正如姜伍发所说：“微信的出现给我们白族调的传承找到了新的方式，我把这种方式叫做微信传承。”

## （三）争夺与互构

微信群的组建，使得传统村落中的社区秩序和权力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转移，人们开始展开对网络社区中公共资源和权力的“争夺”。这种争夺，一方面表现为线下的个体要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就势必要在网络空间中获得话语权。例



如，村里扶贫工作队的人告诉我们，以前县里面要求大学生村官建一个微信群进行线上学习交流，“现在村里涉及公共资源、敏感议题的微信群，群主这些都要求备案的，所以我们在群里都是规规矩矩的”。“备案”制度同样也可以作为线下管控权力的延伸，通过参与线上“微信社区”的权力建构，争夺网络话语空间主导权和管控权。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也是迅速提升个人知名度的极好途径，那些线上活跃的人往往也能集聚社会资本，获得更多村民的认可，因此，群主身份的确立和对群的管理极为重要。调查期间我们遇到村里的大户董家正在召集整个家族的成员为临终前的老人祈福。当家人董二楞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山歌群的管理者，他说这几天自己不方便管理这个群，就暂时把群主的身份转交给另一个村民，等老人的事情办完了，他还会收回群主的身份。

一年一度的石宝山歌会是剑川县最重要的公共文艺活动，政府授予的白曲非遗传承人都曾经在石宝山歌会取得过好名次，这能为他们的白族调演唱技艺提供权威性的证明，为日后的商业演出奠定基础。不同于石宝山歌会的现场演唱，微信对歌群里借助虚拟性和匿名性让更多人参与到白族调的演唱中来，“以前唱白曲、搞文艺这个就是在白族人心目中就是乱，很多人不好意思去歌会唱，也就埋没在农村里面。在微信群里面唱歌也不用被人看着，大家都敢唱了，这样也就涌现出很多尚未被发掘的优秀白族调歌手”。张吉昌说：“几年前我们这里有名的歌手去演出，低于一万块钱他们都不去，现在几百块钱他们都去了。这个微信群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微信群里面唱歌，也不用被人看着，大家都在唱，所以就涌现了很多唱得好的歌手。”借助微信对歌群，有文艺才能的村民能够获得微信社区中成员的认同，由于成员的线上线下的双重身份属性，这些优秀歌手也能在线下提升知名度，从而突破非遗歌手的权威地位，可与传统的石宝山歌手争夺商业演出市场资源。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微信社区和现实社区的关系并非单向影响，两者之间也在不断实现互构。

## 五、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一个白族传统村落社区中展开观察，但聚焦的现象却是一个全新的网络社区，我们试图探究新技术和网络如何逐步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活动之中。吸引研究者的是，村民在手机和微信里将传统的现实生活与网络中的世界结合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并被大家所认可、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微信社区”，从而将村民置于一种“技术性的秩序”之中。

如果将石龙村的微信社区放置回社区研究的脉络中，不难发现，这个讨论可以和社区、共同体研究产生很多可以对话的地方。尽管学者和不同的理论脉络中有着对社区、共同体、社群等基本概念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是将社区看作封闭性的实体，还是强调人们在其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归属感，都不难发现在传统社区研究中，社区是一个具体

可以接触到并且可以划定边界的实体。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具有相对明确的空间划分和相对稳固的形态。而从这个角度讲，微信社区在空间范围和组织形态上，对传统社区有着较大的突破和改变。但是，如果从社区成员所共享的文化、仪式、情感等角度来讲，微信社区和现实社区有着较多的相似性。石龙村的微信社区成员有着显著的共享文化和情感认同，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进而形成社会关系。

对于石龙这个传统村落而言，微信社区的建立也并非偶然，在今天流动性日益加剧的当下，即便是处于边塞的遥远村寨，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这种影响过程中。尤其是在网络技术和信息流动日益深入的影响之下，社会开始“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卡斯特，2006：505）。即便在今天的传统村落，信息、人员、技术、资本等要素也开始频繁发生流动，正如石龙村村民们日益增多的谋生方式，采摘的野生菌可以马上转卖至世界各地，最快可在24小时内运抵到东京、首尔等地，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不断扩大村民的活动范围，当然更有村民通过新技术将白族传统歌舞和文化自如充分地展示出来。可以看到，传统的少数民族乡村并非封闭和缺乏向外交流的可能。即便偏于一隅，村落仍旧有着无数“流动”的方式。甚至“流动”开始成为不断影响村落社会生活，甚至组织村落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重要力量，今日的乡村则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流动”的逻辑组织和运行。从这样的角度讲，石龙村微信社区的建立也是按照流动逻辑组织和运行的一种结果。

当然，和一般性对村落“流动”要素的研究不同，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将这种“流动”更多置于网络技术的平台中展开讨论，关注网络和信息的流动如何创造出新的社会连接方式。而人们对微信的使用，使得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得以建构起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石龙村的微信社区并不是纯粹的技术性存在，而是植根于社会情境和土壤之中，并且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网络型构成的这种流动空间中，“通信网络是基本的空间样貌：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与意义已被吸纳进网络。建构网络的技术性基础设施界定了新空间”（卡斯特，2006：506）。这种新的空间的存在，一方面让乡村社会在经历吉登斯所说的“脱域”（吉登斯，2011：18），但另一方面，由微信建构起来的这个新型社区又不断“嵌入”其现实的乡土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可以说，“微信社区”虽然建立在网络空间中，但这个空间仍旧和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复杂纽结的关系。

对石龙村微信社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村落在面对新技术和新传播网络的影响之下，如何形成一个线上新型社区结构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区结构对传统社区中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

“一个网络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上都以网络为社会和媒体的深层结构的社会。进而言之，不论是个体的，群体的还是组织的，其要素都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迪克，2014：20）。石龙村的村民们，正是通过网络的联系，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讲，在石龙村的个案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今天乡村和都市一样，都被卷入到了网络社会的影响之中。我们在村落中展开的深度观察和研究，对于探讨网络和社会变迁、文化表达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赛博社会学’的核心任务便是考察这些全新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相比在存在模式和运行方式上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阿米蒂奇、罗伯茨，2016：21），那么，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应该被“重新审视”，“它不再是被我们利用的‘工具’，而已成为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赖以生存的环境”（阿米蒂奇、罗伯茨，2016：25）。

---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 黎熙元, 童晓频, 蒋康雄. 社区建设: 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3] [德] 费迪南·滕尼斯著, 林荣远译. 共同体与社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4] 陈美萍. 共同体 (Community): 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1), 第118-123页.
- [5] 陈福平, 黎熙元. 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 地域与社会网络[J]. 社会, 2008(5), 第41-57页.
- [6] 刘江. 重识社区: 从“共同体”到“场域”的转向[J]. 社会工作, 2016(2), 第84-92页.
- [7] 丁未. 流动的家园: “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8] 胡鸿保, 姜振华. 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J]. 学术论坛, 2002(5), 第123-126页.
- [9] 王小章, 王志强. 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 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J]. 学术论坛, 2003(6), 第40-43页.
- [10] 谢静. 虚拟与现实: 网络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互动[J]. 现代传播, 2010(12), 第107-111.
- [11] 王斌, 古俊生. 参与、赋权与连接性行动: 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和理论意涵[J]. 国际新闻界, 2014(3), 第92-108页.
- [12] 郑中玉. 个体化社会与私人社区: 基于中国社区实践的批评[J]. 学习与实践, 2012(6), 第91-98页.
- [13] 牛耀红. 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社区公共领域”——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实践[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4), 第39-56页.
- [14] Hoffmann, S., Evrigenis, I. D., Pellerin, D., and Herder, J. G.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83.5 (2004): 176.
- [15] Park, R. E.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 (1936): 1-15.
- [16]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y Publications* 265.5175 (2000): 1114.
- [17] 蔡骥.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9), 第5-23页.
- [18] 孙信茹. 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10), 第6-24页.
- [19] [美] 曼纽尔·卡斯特著, 夏铸九, 王志弘等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0] [英] 吉登斯, 田禾译.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21] [荷] 简·梵·迪克著, 蔡静译. 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22] [英] 约翰·阿米蒂奇, 乔安妮·罗伯茨编著, 曹顺娉译. 与赛博空间共存: 21世纪技术与社会研究[M].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6.

# JOURNALISM RESEARCH

---

VOLUME 172, NO. 8, 2020

## 1 "WeChat Community" Embedded in a Local Village: On Bai-ethnicity Villagers' WeChat Life

---

· YANG Xing-xing, TANG You-you, SUN Xin-ru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ology of field observations, with a focus on how the traditional Bai villagers form their new network community through WeChat. This research illuminates that by using cellphones and WeChat, villagers manage to integrate their traditional real life and the online world into a brand-new lifestyle that features universality and is widely accepted. This kind of life practice constitutes a "WeChat Community", which places the villagers in a "Technical Order". On the one hand, the existence of "WeChat Community" allows the village to become a "Disembedding Community" to some extent. On the other, this new community constructed by WeChat is embedded in its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This study on the life and experience of the WeChat Community in Shilong village indicates that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network gradually creep into villagers' daily life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us a new online community structure is formed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is kind of community structure has a major impact on social rel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life style of local communities.

**[Keywords]** WeChat community; Bai minority; village; WeChat life

## 16 Embedded Communication: The Practice and Reproduction of Internet Language in Daily Life

---

· ZHAO Cheng-che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and spread widely in dail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adolescent groups and explores how Internet